

本文摘录自《复兴记》（作者：茅氏）第1.3章。

预览《复兴记》全本 及其各种版本 可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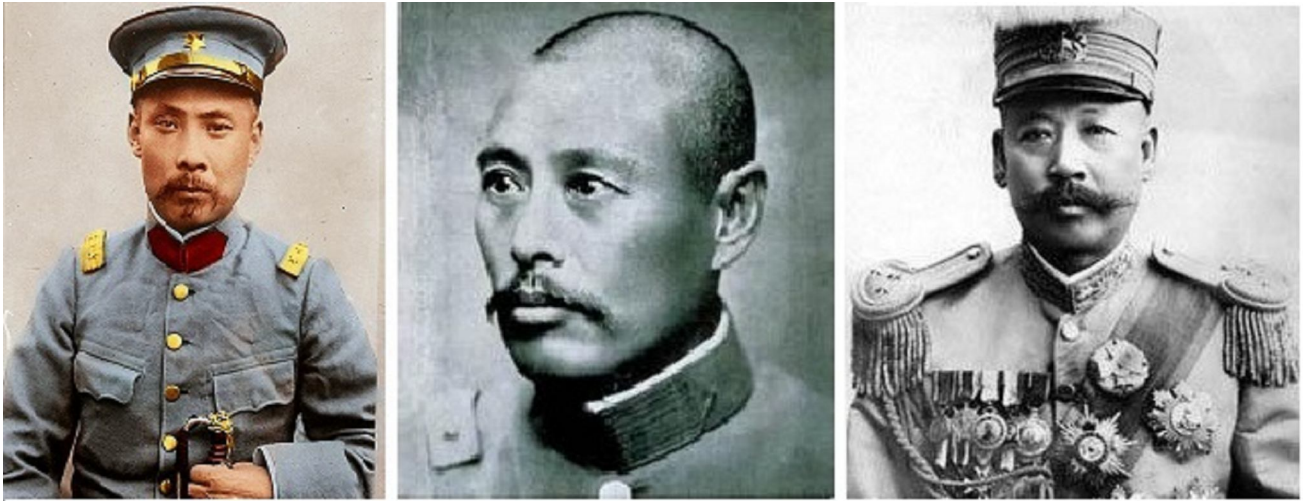
<https://play.google.com/store/search?q=revival%20china%20mao%20min&c=books>

或 <https://payhip.com/fuxingjimaomin>

或 <http://fuxingjimaomin.wix.com/fuxingjimaomin>

第 1.3 章 军阀统治

袁世凯辞世后，他属下的北洋军 分裂为两派：皖系，以段祺瑞为首，控制皖、浙、闽、鲁、陕等省；直系，先后以冯国璋、曹锟、吴佩孚为首领，控制直隶（注：即河北）、苏、赣、鄂等省。北洋军阀之外，另外还有个奉系，以张作霖为首，占据着奉天（注：即辽宁）等东北三省。这三大军阀系统，为了争夺全国的统治权，互相开战。除了这三大军阀，还有些省级的军阀：晋系军阀阎锡山 统治着山西、滇系军阀唐继尧 统治着云南、桂系军阀陆荣廷 统治着广西，等等。中国大地上，军阀混战。而孙中山等国民党人，或流亡海外，或居住在上海等地的租界里（注：中国对这些租界 无管辖权，军阀不能去那里 捉拿他们）。



左起：段祺瑞、吴佩孚、曹锟。

辫子军复辟

袁世凯辞世后，副总统黎元洪 继任中华民国总统，另选直系军阀冯国璋 为副总统，而皖系军阀段祺瑞 就任国务院总理兼陆军总长。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段祺瑞主张对德国宣战，黎元洪、国会则坚决反对，形成“（总统）府、（国务）院对立”。

在徐州一带，有个较小的军阀，名叫张勋。黎元洪、段祺瑞争相拉拢他。张勋一心想清朝复辟，就装成黎、段两人之间的调解人，暗地里却在积极为复辟作准备。1917年5月下旬，黎元洪得知段祺瑞暗地里策划用武力推翻他，于是下令免去了段祺瑞的国务院总理职务。张勋说：中国不可搞共和，黎、段两人的争斗就是明证。6月7日，他率领他的“辫子军”（注：张勋所部还留着前清的长辫子）北上。14日，辫子军到达北京。30日，张勋潜入清宫，商定于当晚起事。7月1日凌晨1时，张勋穿上蓝纱袍、黄马褂，戴上红顶花翎（注：这是清廷朝官的标准穿戴），率领康有为（注：他曾推动“变法维新”运动，失败后组织“保皇会”，鼓吹开明专制，反对共和制，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）、刘廷琛（前清进士，是与张勋密谋复辟的主要人物之一）等人，以及辫子军的统领们，共50余人，乘车进宫。晨3时许，清废帝溥仪在养心殿召见张勋等人。张勋率领诸人，向溥仪行“三拜九叩头”的对“皇上”的大礼。然后，张勋说他有话要奏，得到皇上允准后，说道：当年“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尊荣，让百姓遭殃，才下诏办了共和，谁知办得民不聊生。共和不合咱的国情，只有皇上复位，万民才能得救。”12岁的溥仪说：“我年龄太小，无才无德，当不了如此大任。”张勋说：“皇上睿圣，天下皆知，过去圣祖皇帝也是冲龄践祚。”溥仪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勉为其难吧！”同日，溥仪发布“即位诏”，称“共和解体，补救已穷”，宣告亲临朝政，收回大权。在张勋等人的协助下，他一连下了八道“上谕”，封官授爵、恢复清朝旧制。参加这次复辟的重要人员，均被授以要职：张勋为政务部长兼议政大臣，并被封为“忠勇新王”；康有为就任“弼德院”副院长，等等。张勋然后通电全国各省，宣布已“奏请皇上复辟”，要求各省应即“遵用正朔，悬挂龙旗（注：清朝的国旗）。”

消息传出后，立即遭到全国声讨。孙中山在上海发表《讨逆宣言》。段祺瑞组成“讨逆军”，进攻张勋所部。防守的辫子军本来战斗力就很弱，一触即溃。张勋在德国人（注：德国支持清朝复辟）保护下，逃入荷兰使馆。溥仪只得再次宣布退位。7月14日，段祺瑞率部进入北京。8月1日，黎元洪辞去总统职位，副总统冯国璋就任代总统，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。

直皖战争

直系的冯国璋与皖系的段祺瑞，一个是代总统、一个是总理，两人上台不久，就争斗剧烈。当时，孙中山与西南军阀唐继尧、陆荣廷一起，在广东联合组成了“护法军政府”，以此对抗在北平的中央政府时。对此，段祺瑞主张派兵讨伐，“武力统一”；而冯国璋则主张“和平统一”。这样，皖、直两系的矛盾就公开化了。

不久之后，段祺瑞宣布：民国法统曾经中断，现在再造共和，必须另组国会、重议宪法。如他所愿，新选的国会于1918年8月召开；其中，“安福系”（支持段祺瑞的一个议员组织）议员在新国会中占绝对多数。新国会选举徐世昌（他没有参加派系，既非直系、也非皖系）取代冯国璋任中华民国总统。段祺瑞也同时辞去总理职务。这样，无派系的徐世昌做了总统；直系的冯国璋、皖系的段祺瑞，表面上都下台了，但实际上都仍在幕后操控局势。

新总统徐世昌的地位并不稳固。1920年初，时任第3师师长的直系将领吴佩孚与南方的“护国军”共组“救国同盟军”，计划驱逐总统徐世昌，另组南北统一的政府。5月底，吴佩孚率领第3师从湘南抵达汉口。接着，又进军河南，将部队分驻在京汉铁路沿线各地。同时，直系首领曹錕（注：原首领冯国璋此时已病逝）出兵德州，作为直军右翼的前哨阵地，与吴佩孚相呼应。6月15日，曹錕、吴佩孚等直系将领，在保定举行了秘密军事会议。与此针锋相对，皖系首领段祺瑞于7月8日在团河成立了“定国军”总司令部，自任总司令，以徐树铮为参谋长，段芝贵为第1路军司令兼京师戒严总司令，曲同丰为第2路军司令兼前敌司令，魏宗瀚为第3路军司令。段祺瑞强迫总统徐世昌颁布了惩办曹錕、吴佩孚等人的命令。然后，段祺瑞在北京召集全体阁员、军政人员举行联席会议，决定举兵讨伐曹錕、吴佩孚。就在同一天，直系首领曹錕、吴佩孚也召集紧急会议，与会的有“八省同盟”的代表，还有表面上中立的奉系首领张作霖。第二天，曹錕宣布成立“讨逆军”，以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。张作霖回到奉天后，决定其第27、第28两个师各派出一个旅入关，以张景惠为司令，出兵的名义是保护关内的京奉铁路。

1920年7月14日晚，直皖战争正式爆发。两军在东、西两个战线开打。

东战线在京奉铁路沿线，皖军的徐树铮部对直军的曹錕部。7月15日夜，战斗在天津的杨村打响。守在杨村的部队，是直军第4混成旅、直隶警备军步兵，共约二万人。进攻杨村的是皖军第2混成旅、边防军第3师步兵第2团，共约一万五千人。守军在杨村火车站吊桥的两旁排列多尊大炮。邻近那里，有一个日本军队的驻扎所。多名日本军官出来抗议，一定要直军将该处所有大炮即时移走，并声言不准在铁路附近两英里以内作战。直军只得后退，防线出现一个裂口。皖军从这个裂口蜂拥而入。直军只得后撤，但仍很有秩序：以机关枪队押后，顺序而退，队伍不乱，退至北仓、李家嘴之间。这时，奉军到达，直军自此声威又振。直、奉两军联合进攻皖军，由廊坊向前猛击，皖军溃败，死伤千余人。至20日，京奉线一带的皖军已逃走一空。他们向蒙古边境方向逃窜，但被察哈尔都统王廷楨、绥远都统蔡成勋拦阻。皖军东路指挥徐树铮，逃回北京后，东躲西藏：或居六国饭店，或住某外国人家里，行踪诡秘。

西战线在京汉铁路沿线，皖军的段芝贵部对直军的吴佩孚部。直军在河北的高碑店，皖军在涿州、固安、涞水一线。7月14日晚，皖军第1军以第15师为前锋，向直军第3师进攻，直军退出了高碑店。不料，直军在半夜派出一个营包抄了皖军的后路。直军两路夹攻，皖军大败，退回琉璃河。次日晚10时，皖军段芝贵下令向驻扎在高碑店的直军攻击，将士不应，而两翼先退，正面军队然后也后退约30里。16日，两军再战，皖军又败，伤亡甚多。次日晨，两军战于涿州之北，皖军旅长范尚品阵亡，各级军官及兵士伤亡者不计其数。师长曲同丰，鉴于全军已无战斗力，树起白旗向吴佩孚求和。吴佩孚命令：先缴军械，再行停战。曲师长遂投降，但吴佩孚拒而不见，命令立即解往保定，请曹錕处置。曹錕仍对曲师长优礼相待，劝他去逆效顺。曲师长遂致电皖军全体，希望他们与曹錕一致。与此同时，皖系第15师师长刘询乘隙潜逃，部下全部投降。皖军西线指挥段芝贵身负重伤，逃回北京。至此，西线皖军无人统率，兵士更无斗志，一遇直军，非降即逃。

7月19日，皖系首领段祺瑞 通电辞职。第二天午后，直军大队抵北京的长辛店，将溃散皖军一律扫清。23日，直、奉联军的先头部队 开进北京城，分别接收了南、北苑营房；但相约各自的大部队都不入城。至此，直皖战争只打了四天 即以直系全胜而告终。直皖战争结束之后，直系、奉系共同控制北京政权。

在直皖战争期间，粤军总司令陈炯明（国民党人）成功驱逐了占据广州的桂系、滇系军阀。之后，孙中山来到广州，决定在广州举行一个非常国会 选出一个大总统，以与在北京的总统徐世昌抗衡。1921年4月7日，非常国会共222人 在议长林森主持下 选举总统，结果孙中山得218票，陈炯明得3票，1票无效。5月5日，孙中山就任总统职，称自己为“非常大总统”。他随即向国内外发表声明，并写公开信给徐世昌劝他自动离职。他任命 陈炯明为陆军部长兼内政部长、胡汉民任总参议兼文官长、唐绍仪为财政部长。但陈炯明、唐绍仪都没有到任。 这个政府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。存在一年之后，即1922年6月16日清晨，陈炯明命令所部 进攻孙中山所在的总统府，孙中山先是逃到珠江上的永丰舰，后来经香港 赴上海，而非常大总统一职 也就自动停止了。

第一次直奉战争

直系、奉系 在联手大败皖系之后不久，双方就发生矛盾。1922年1月初，直系军阀吴佩孚 联合六个省的军政首长，通电谴责梁士诒内阁 媚日卖国。梁士诒是在奉系首领张作霖的支持下 就任国务总理的。15日，梁士诒被迫请假离京。自此，直、奉矛盾激化。 4月底，张作霖率领十二万军队 经山海关入关。他到达天津军粮城后，自任“镇威军”总司令，并下达了对直军的总攻击令，直奉战争由此爆发。 直系方面，吴佩孚率领七个师、五个旅，共约十万人，分两路对抗：西路为驻在琉璃河的吴佩孚的第3师、驻在固安的王承斌的第23师等部队；东路为驻在马厂镇的张国溶的第26师、张福来的第24师等部队。4月29日，直、奉两军 在马厂镇、长辛店、霸县激战，互有胜负。接着，吴佩孚出奇兵、绕道攻击奉军后方。奉军腹背受敌，再加上奉军第16师临阵倒戈，致奉军全线崩溃。5月4日，直军占领了长辛店、永清、静海。接着，直军获胜追击，迫使张作霖退守山海关。但直军对山海关的进攻，遭到奉军张学良、郭松龄部队的顽强抵抗。5月5日，经外国传教

士调停，这次直奉战争结束，双方在停泊在秦皇岛海港的英国军舰上 签定了停战和约。直系军阀吴佩孚 此前大败皖军、这次又赶走奉军，因而名声大振。

奉系军阀张作霖，幼时给人放猪。12岁时，去私塾 偷偷听课，被塾师杨景镇 发现后 允其免费读书。他自幼就十分机灵。14岁时，父亲去世，随母亲前往镇安县 投奔外祖父。为谋生，他卖过包子，当过货郎，学过木匠，后跟随继父学兽医、相马。1894年，为报父仇而杀人、流落至营口。适逢中日甲午战争爆发，便投入驻营口 田庄台的“毅军”，后被提拔为 统领宋庆的卫士，再升任伍长。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后，他回到故里，投身草莽，组织土匪武装“保险队”，在黑山南的赵家庙一带劫掠。1901年除夕，他遭匪首金寿山 勾结俄军马队 偷袭，损失惨重，最后仅剩八人，逃走。他后来投靠张景惠，当上了八角台的团练长。1902年，他的队伍被官府收编，他本人就任巡警马队的帮带、统带。1906年，任巡防营的前路统领，驻防辽源一带。后因剿匪有功，晋升为洮南镇守使。1911年武昌起义时，张作霖应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之召，起兵勤王，任“奉天国民保安会”军事部副部长，镇压革命军，受到清廷破格升赏，出任“关外练兵大臣”，赏顶戴花翎，并被委任为掌管奉天军事大权的巡防营务处总办，成为奉天省的最高军事首领。袁世凯出任总统后，张作霖被任命为第27师中将师长。袁世凯称帝后，张作霖被封为子爵、盛武将军，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。袁世凯死后，被北京政府任命为 奉天督军兼省长。1918年9月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，在日本帮助下控制了辽、吉、黑三省，成为奉系首领。

曹锟是如何当选总统的

直奉战争的硝烟一结束，直系首领曹锟 就召集得胜的直系将领们 在河北的保定开会。会上，他的亲信们 要拥戴他做总统，赶走现任总统徐世昌；而吴佩孚则提出一个迂回的策略：先让黎元洪复总统职，这样来赶走徐世昌；然后再让国会来选举曹锟做总统。大家认为 这是个好主意。

1922年5月14日，吴佩孚密电 担任省军政首长的 各位直系将领，就恢复国会、请黎元洪复总统职等问题 征求意见。当天就得到了江苏、山东、湖北三省 军政首长的同意。次日，担任福建军务督理的孙传芳 也

通电赞同。27日，吴佩孚发一密电给徐世昌，要求恢复第一届国会，并称已得到十余省赞同。徐世昌口头上佯作谦和，说吴佩孚的办法“确实合法”。次日，孙传芳发一个通电，请南（孙中山）北（徐世昌）两总统同时退位。徐世昌立即发表通电，表示孙传芳所陈意见乃“忠言快论”、“实获我心”、“一有合宜办法，即便束身而退，决无希恋”。

6月1日，原第一届国会的议员，共203人，在天津开会，并以旧议长吴景濂、王家襄领衔发表宣言，多方指责徐世昌，宣称他是伪总统，并宣布：自即日起，由国会行使总统职权。徐世昌保持沉默。次日，吴佩孚让其常驻北京代表钱少卿，一日数次打电话到总统府，催问徐世昌何时离开北京？徐世昌只得发布通令称“本大总统现患病，宣告辞职”，然后回到天津英租界的私宅居住。

接着，吴佩孚、曹錕加紧活动，请黎元洪复职。6月2日，议长吴景濂等人去黎宅，请黎元洪复任总统。黎元洪以开玩笑的口吻说：“你们选举曹錕为总统，事情就好办得多。”同日，曹錕、吴佩孚领衔通电“恭迎黎大总统复职”。他们派出几名参谋长，与内阁的代表一起，到天津迎接黎元洪。黎元洪是在九年多前，即1913年10月，就任副总统的，1918年6月顶替辞世的袁世凯任代理总统，次年7月张勋搞复辟时被赶下台。此后一直闭门谢客，不闻世事已达三年。现在直系的重要人们不断登门劝驾，黎元洪说他只得再“往火坑里跳”。1922年6月10日，黎元洪正式通电复任总统。

黎元洪复任总统一年之后，即1923年6月初，让国会准备总统大选。曹錕及其追随者认为黎元洪此举是为了自己继续做总统，于是就采取措施逼迫黎元洪辞去总统职务。他们让全体阁员提出总辞呈、然后相继离京，致使政务无人负责。接着，京城的五百余名军警，以内阁辞职致军饷无着为由，到总统府索饷。黎元洪答应在12天内筹饷四百万元，这样军警才退去。曹錕又派人雇佣一批流氓，自称“公民团”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“国民大会”，要求黎元洪“即日退位，以让贤路”。6月9日，北京全体警察罢岗。10日，军警数百人到黎元洪在东胡同的私宅索饷，纠缠到下午3时才散去。接着，又有“市民请愿团”、“国民大会”代表约一千人，手持“改造政局”、“总统退位”等纸旗，到黎元

洪住处抗议，呼声震天。当晚，黎宅电话被切断，自来水管被堵塞。黎元洪不得已，向曹錕、吴佩孚求援，但没有得到回应。12日，陆军检阅使冯玉祥、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联名呈请辞职，黎元洪下令加以挽留，退还辞呈；冯、王两人却拒不接受黎元洪的挽留。黎元洪先后商请顾维钧、颜惠庆组阁，但均遭拒绝。此时，连总统府的秘书长饶汉祥这样的身边亲信，也请辞。黎元洪环顾四周，一片楚歌。他决定：本人已不能在京行使总统职权，万不得已，只得将政府迁往天津。他在出走天津之前，将大总统印信大小共十五颗，交给他的如夫人（注：这是对姨太太的尊称），并让她去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居住，秘书瞿瀛随行。13日下午，黎元洪在美国顾问福开森等人的掩护下，偕十余人，并卫队四十余人，乘专车离京赴津。

黎元洪离京后，国务院秘书长张廷谔去总统府寻找总统印信，但没有找到，便打长途电话给王承斌（直隶省省长，上将军衔），让他在天津火车站搜查黎元洪乘坐的火车。王承斌遵命，率警务处长杨以德，并军警多人，来到杨村火车站，这是到天津之前的最后一个车站。他在车站声称：他是来迎接黎元洪总统的。火车到后，杨以德派军警把守车门，王承斌到黎元洪的坐席问道：为什么要携带印信出京。黎元洪回答说，印信在北京，并未随身携带。王承斌说：“你应当说老实话。”黎元洪怒道：“我不把印信交给你们，你们把我怎样？”王承斌冷笑一声，说：“那么，总统还是回到北京去的好。”说完就下了火车。等火车到了天津新站，王承斌命令将火车头摘去，并派军警千余人，严密包围火车，禁止任何人下车。他自己上车，催黎元洪交出总统印信。黎元洪不理他。黎元洪让美国顾问辛博森下车（注：外国人下车，包围火车的军警不敢阻拦），到电报局发电报通告全国总统已失去自由；然后让他去英、美两国领事署请求援助。辛博森去后，黎元洪曾企图开枪自杀，但被另一美国顾问福开森推开，仅负一点皮肉伤。晚上10点，黎元洪被逼不过，只得向王承斌告以实情：印信已交给秘书瞿瀛，随其如夫人现在都在北京的法国医院。王承斌让黎元洪打电话告知瞿秘书、如夫人：将印信交与国会。6月14日，如夫人将总统印信全数交出。王承斌接到北京电话证实后，又上车，拿出代拟的致国会、国务院、诸省的信件各一份，逼黎元洪签字。这些信件写着：“本人因故离京，已向国会辞职，令国务院代行总统职权。临行前所发命令无效。”黎元洪只得签字。然后，他被允许下车回在天津的家。黎元洪到家后，随即发表通

电，宣告被逼交印的情形，并声明被迫所签之信件全部无效。但社会上没有任何反应。

黎元洪被赶下台后，直系首领曹锟以四十万元收买国会议长吴景濂，为选他当总统效力。于是，吴景濂在两院谈话会上提议：出席选举总统的议员都能得到“出席费”，每人一百元。但议员们的要价更高，认为一百元太少，因此当他召集议员参加总统选举的预备会时，来的议员很少，预备会就没有开成。吴景濂把出席费提高到每人五百元，十天后再次召集预备会。这次来出席的人数多了不少，达422人。但是，选举法规定正式选举总统时出席人数不得少于581人，也就是说还差159人。经过二十多天的讨价还价之后，吴景濂最后答应：出席费为五千元，并定于10月5日举行大总统选举。

1923年10月5日上午，大批宪兵、军警出动，在通往议会的道路上夹道排队，只许议员及特准的参观人员通过，其他人等不得通过。到预定开会的10时，到会的议员仍然不够多；等到近中午时签到者还是不到五百人。吴景濂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，便派可靠的议员分途去拉同乡、同党的议员，要求每人至少拉一人回来。有些患病的议员也被拉来。到下午1时20分，签到者终于达到593人，于是摇铃开会、投票。投票至4时完成。吴景濂报告说：投票总数为593票，曹锟得480票，超过四分之三，按选举法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。议员们鼓掌如雷。10日，曹锟从保定赶到北京就任总统。

第二次直奉战争

直系首领曹锟就任总统后，奉系军阀张作霖不服气。1924年9月15日，他率十五万大军，分山海关、赤峰两路向关内进军。直系将领吴佩孚，自任“讨逆军”总司令，率二十万人应战。10月9日，奉军攻占赤峰。在山海关，双方争夺激烈，相持不下。

10月23日，冯玉祥率西北军进入北京，囚禁了总统曹锟，驱逐逊清皇室出故宫。接着，他宣布成立“国民军”，并邀孙中山北上，欲以孙中山主持全国政事，而以段祺瑞（皖系首领）主持全国军事。

直系将领吴佩孚闻讯，从山海关率兵一部回救北京，并急调江、浙等省的直系军队北上驰援。奉军乘机由冷口突入长城，截断直军后路。山西军阀阎锡山，出兵到津浦、京汉铁路沿线，以阻止直系援军北上。在各方夹攻下，吴佩孚在华北的直系主力全军覆灭，率残部两千余人自塘沽登船南逃。于是，张作霖、冯玉祥等人在北京以“善后会议”取代国会，并成立中华民国“执政府”，推举皖系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，兼有总统、总理之职权。

孙中山的第三次革命

1917年，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皖系军阀段祺瑞解散了国会、废止了《临时约法》。国会解散后，议员们分赴津、沪等地，谋划护法事宜。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权邀请他们南下广州。8月18日，孙中山在黄埔公园宴请南下国会议员120多人。至25日，已有150多名议员到达广州，但仍不足法定开会人数。不过他们还是举行了“非常国会”。29日，会议通过了《国会非常组织法大纲》，决定成立军政府。31日，会议又通过《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》，规定在《临时约法》未完全恢复之前，行政权由大元帅执掌。孙中山被推举为大元帅。这个军政府包含广东、广西、云南的各军阀，他们名义上服从孙中山，但真要他们的军队开拔，他们就要孙中山发军饷、发开拔费。但是，孙中山的财政来源十分有限，发不出军饷。一天，为了让滇、桂军出发去前线，孙中山让胡汉民以孙大元帅的名义下一个手令，向广州市政厅提款20万元现金，作为滇、桂军的军饷。胡汉民代写了大元帅手令后，派副官张猛持该手令到市政厅提款。张猛来到市政厅，但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，才见到市长孙科（注：他是孙中山的独子）来办公室上班。张猛将提款手令面交孙科。孙科看了一眼，就说：“我不会印银纸，哪里有这么多钱？”说罢，随即将手令撕碎，投进废纸篓，然后坐汽车走了。张猛回到总统府，把情况报告了孙中山。孙中山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。然后他打电话，让孙科过来一次。不久，孙科来到父亲跟前，还没有开口，孙中山就厉声叱责道：“军情如此紧急，急需发饷给滇、桂军出发，你马上拨20万元来，你若办不到，就不要做市长！”孙科唯唯诺诺。他跑到二楼，找胡汉民出气，说胡汉民假借命令、挑拨他父子不和。胡汉民气得大叫：“这是你父亲叫我写的，怎么是‘假借命令’？”孙科举起手杖（注：他年轻，本来是用不著手杖的，但那年代

的人爱装文明，学西方人拿个手杖，称之为“文明杖”，孙中山、蒋介石都是如此），就向胡汉民打去。胡汉民一闪身，手杖落在办公桌上的玻璃板上，顿时“嘭”的一声响。这惊动了在三楼的孙中山。孙中山下楼来，看见这种情景，一手夺来卫士的驳壳枪。孙科慌忙逃走。孙中山一面追，一面骂。一直追到帅府大门口，连拖鞋也掉了。李烈钧、朱培德闻声赶来，把孙中山劝住。孙中山回办公室，生闷气。

不久之后，桂、滇系军阀逐渐控制了军政府。1918年，他们改组了军政府，以七总裁取代大元帅，把孙中山架空。孙中山被迫去职，又去了上海。

1920年，粤军将领陈炯明成功击退广州地区的桂、滇系军队后，请孙中山重回广州。是年底，孙中山回到广州。次年4月，广州非常国会取消军政府，改总裁制为总统制，并选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。孙中山就职后力主军事北伐。年底，孙中山在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。他想要指挥粤、滇、桂军北伐，消灭北方军阀，统一中国。

但是，陈炯明不主张北伐。孙中山对陈炯明不听他的话非常生气，于6月12日举行记者招待会，斥责有人“反对北伐”，向陈炯明施加舆论压力。不久，陈炯明将部队退回东江地区的原防地。到达东江的第二天，陈炯明对粤军高层下达了攻击孙中山卫队的密令。15日，陈炯明让叶举在粤军总司令部召集旅以上军官会议，确定由军长熊略为进攻广州城的指挥官，洪兆麟的第2师攻击越秀楼（注：孙中山住所），炮兵司令王愷庵负责向总统府开炮；集结的总兵力为25000人。不料，熊略一边布置战事，一边却派连长陆志云向孙中山密报，请孙中山出走。但孙中山误以为这是对方虚张声势，不肯离开越秀楼。当晚，广东警察局长李安邦、总统府顾问陈少白先后到越秀楼报告陈炯明部队已开始包围总统府，劝孙中山撤离。16日凌晨，孙中山刚就寝，电话铃声响起，这是广东海防司令陈策打来的电话，他报告说：陈炯明的队伍已占据广州各处街衢，请总统迅速撤离。孙中山正焦急间，总统府秘书林直勉、参军林树巍、北伐大本营运输连长陆志云先后闯了进来，说：“我们连叛军今晚的口令都搞清楚了，是‘食饱饭，杀民贼’。大总统要不撤离可就危险了。”但孙中山还是没有马上离开。凌晨2时许，外面嘈杂声大作，呼喊着：“打死孙文！”林直勉等近卫冲

入屋里，强掖孙中山离开。孙中山发怒说：“竟存（注：陈炯明的字）胆敢作乱，我便负平乱之责，如力不足，唯有一死，以谢我四万万同胞。”林直勉等不由分说，给孙穿上夏布长袍，戴上墨镜、便帽。孙中山要他的妻子宋庆龄一起撤离，但宋庆龄说两人同行目标太大，要孙先走，她随后再走。于是，孙中山和宋庆龄，各自乘夜色先后逃出。6月18日，孙中山登上停泊在珠江口的永丰号军舰。

除了永丰舰，还有几艘军舰支持孙中山，它们组成了一个舰队。孙中山发电报给在浙江溪口家乡的蒋介石（注：他曾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、粤军第二支队司令，因受粤军将领排挤而离职，当时滞居浙江家乡）：“事紧急，盼速来。”此前，蒋介石已接到汪精卫等人的电报，知道陈炯明叛变、孙中山处境危急。他立即出发去上海，几天后等到了一艘去香港的船，到达香港后随即租了一只小船，越过海面，进入珠江口，直奔永丰舰。6月29日，蒋介石在永丰舰上同孙中山见面，两人紧紧握手，许久无言。然后，蒋介石问候道：“先生，您受惊啦！”孙中山答道：“你来了，我就放心啦。”遂即把军事指挥全权交给蒋介石。孙中山对随船的外国记者说：“蒋君一人来此，不啻增加二万援军。”蒋介石命令永丰舰等军舰先移泊黄埔附近的新造河。7月10日，蒋介石指挥永丰、楚豫、豫章等舰一边炮击车歪炮台，一边冲过陈炯明部队的炮火封锁。孙中山经蒋介石劝说进入底舱休息，而蒋介石站在舵楼上，指挥舰队前进。虽然永丰舰被敌人的炮火击伤，但终于冲破炮火封锁泊入白鹅潭，在那里等待北伐军南下回救。当时正值盛夏，舰上燥热，又缺少青菜、淡水。蒋介石亲自带队冒着危险上岸寻找食物。晚上，他就睡在甲板上。然而，不利的消息接连传来：先是舰队内的三艘巡洋舰叛变投敌，接着是北伐军第1师投敌，然后是许崇智率领的来援的讨伐军受阻于途。永丰舰上的孙中山，孤立无援。8月9日，孙中山采用蒋介石的建议，在蒋介石的护送下，离粤去了上海。蒋介石在患难之中随侍孙中山40多天，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他认为蒋介石是真心听从他的。事后，蒋介石写了《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》一书。孙中山为该书写了一篇序，其中说：“陈逆之变，介石赴难来粤，入舰日侍余侧；而筹策多中，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。”

孙中山的第三次革命又失败了，他再次回到了上海租界。

总统换了一个又一个

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28年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，这十六年中，共有17人担任过中华民国总统或相当于总统的职位，他们是：

孙文（1912年1月1日-1912年2月13日，临时大总统），
袁世凯（1912年3月10日-1913年10月10日，临时大总统；1913年10月10日-1916年1月1日，大总统；1916年1月1日-1916年3月22日，皇帝；1916年3月22日-1916年6月6日，大总统），
黎元洪（1916年6月7日-1917年7月1日，大总统），
冯国璋（1917年7月6日-1918年10月10日，大总统），
徐世昌（1918年10月10日-1922年6月2日，大总统），
周自齐（1922年6月2日-1922年6月11日，国务总理署任大总统），
黎元洪（1922年6月11日-1923年6月13日，大总统），
高凌霨（1923年6月14日-1923年10月10日，代总理署任大总统），
曹錕（1923年10月10日-1924年10月30日，大总统），
黄郛（1924年11月2日-1924年11月24日，代总理署任大总统），
段祺瑞（1924年11月24日-1926年4月20日，临时执政），
胡惟德（1926年4月20日-1926年5月13日，代总理署任临时执政），
颜惠庆（1926年5月13日-1926年6月22日，总理署任大总统），
杜锡圭（1926年6月22日-1926年10月1日，代总理署任大总统），
顾维钧（1926年10月1日-1927年6月16日，代总理署任大总统），
张作霖（1927年6月18日-1928年6月3日，陆海军大元帅）。

（注：1928年之后，国家元首称“国府主席”，1949年后又恢复称“总统”。）

这些总统，除了孙文之外，大多是军阀或其附庸，但其中有几个竟然比较廉洁。

段祺瑞就是其中之一，他说他做人的信条是：“不抽（鸦片）、不喝（酒）、不嫖、不赌、不贪、不占”，人称“六不总理”。这“六不”他都做到了（注：不嫖”这条他是做到了，但却娶了五房姨太太）。他一生没有房产，在北京一直是租房子住，直到袁世凯送了套房子给段祺

瑞的妻子张氏（注：她是袁世凯的养女）。这栋房产的原房主，在与袁世凯打牌时输了四十万大洋，把房子抵押给袁世凯，可没给房契。等袁世凯一死，原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来找段祺瑞，要收回房子。段祺瑞见人家手中有房契，二话没说，带着一家人就搬了家。后来段祺瑞到天津、上海，都是租房而住。作为当时的军政首脑，很多人给段祺瑞送礼。但他从来不收礼，只有在最亲近的下属、友人送礼而却之不恭时，才会从礼物中挑选一两样最不值钱的东西留下，余者则悉数退还。他曾收到江苏督军齐燮元送来的几扇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屏风，非常珍贵。段祺瑞的家人都喜欢得不得了，盼望能留下这件宝物。谁知第二天一早，段祺瑞就派人将屏风退还给了齐燮元。一次，张作霖给他送来一些东北特产，并不值钱，但段祺瑞还是不肯收，最后在张作霖副官一再恳求下，才勉强收下两条江鱼。只有一次可算例外：段祺瑞将别人送的礼物照单全收，那是冯玉祥送来的一个大南瓜，因为不能把南瓜切一半还给冯玉祥。段祺瑞不嫖妓，但还是讨了几房姨太太。他的第四房姨太太，貌美如花，知书达礼，段祺瑞很喜欢她，娶来后每晚都宿在她的房里。但后来段祺瑞得知她来他家之前就已有意中人，就让他正房妻子出面，像嫁女儿一样，置办嫁妆，吹吹打打，很热闹地成全了她和意中人的婚事。这在当时曾传为佳话。1926年，在发生军警屠杀爱国请愿学生的惨案后，时任临时执政（注：即临时总统）的段祺瑞随即赶到现场，向死者长跪不起，之后又作出严厉处罚凶手的指示，并决定终身食素，以示忏悔。他至死都没有违背食素的诺言。1934年春，他胃溃疡发作，胃部大出血，被送到医院治疗。段祺瑞此时身体十分虚弱，医生、家人一再劝他开荤，以增加营养，但他断然拒绝：“人可死，荤绝不能开！”这也是很难能可贵的了。在日本侵略中国时，日本人要他出来主持傀儡政权，被他拒绝，他保住了民族气节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，章士钊与毛泽东闲谈时说起段祺瑞，毛泽东说：“有功有罪，已经化敌为友了嘛。”

吴佩孚也是比较廉洁的。他出身秀才，曾提出“三不主义”，即不住租界，不积私财，不举外债；而且说到做到。他事业顺利时拒绝过苏联、欧美的示好，失意时坚决不做汉奸。吴佩孚不爱财，也不好色。有个日本姑娘向吴佩孚写情书，他在情书上批示：“老妻尚在”。他也禁止亲族在他手下做官。在政治生涯结束之后，吴佩孚在四川又回复到秀

才的本来面目，终日读书、写作、吟诗、画梅，不问政治。在日本侵略中国时，吴佩孚也保住了民族气节。